

国际移民问题：历史发展与研究挑战^{*}

张振江 陈礼豪^{**}

内容提要：人口的流动与迁徙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古老而又普遍的现象，但直到领土国家和民族国家从概念到实践逐渐清晰后，国际移民才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现象，引发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自17世纪以来，国际移民研究历经美洲殖民地独立、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全球化这三次重大的历史契机，才发展成一个多学科性质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和战乱冲突导致的难民潮等新现象，一方面使国际移民研究的关注热点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更加凸显了国际移民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未来，国际移民问题仍将一方面长期受困于与民族国家的纠葛，另一方面受困于诸如新冠疫情这类“黑天鹅事件”的冲击，但在实践与理论层面积极因素的助力下，相关研究挑战也有望化作机遇。

关键词：移民问题 现代国家 跨国主义 全球化 百年变局

一、引言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人口的流动与迁徙是古老而又普遍的现象。关于现代人类的起源，无论是“非洲起源说”还是“多点起源说”，都注意到了历代先民在十余万年的漫长岁月中不断地跨越地理界限，交流融合，最终才使得人类的足迹遍布全球。当在西欧率先形成的现代国家逐步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华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张振江，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陈礼豪，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后,领土国家、主权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概念与实践愈发重要和固化。即便如此,国家对国民的管理依然无法阻挡人类的流动,此后,跨越国家边界的移民(即国际移民)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现象,逐渐引发学界的关注和讨论。¹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作为一种现象的国际移民的由来与发展,接着对国际移民问题及其研究的发展脉络及代表性理论成果进行回顾,然后进一步剖析国际移民问题当前关注的热点、面临的挑战,最后对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前景作出展望。

二、国际移民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人类的流动与迁徙由来已久,但国际移民却是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诞生以来的一种特殊现象。随着现代国家逐步成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国际移民也越来越引人注目。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全球国际移民规模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仍继续增长,截至2021年底总量已达2.81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3.6%。²这足以彰显国际移民之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已进入“移民时代”。³

国际移民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历程。成规模的、持续的、洲际的国际移民与地理大发现相伴相生。1500—1800年的世界被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称为“现代世界体系”,它实际上是由数百万欧洲殖民者、非洲奴隶、罪犯、农场主、宗教异端人士、自由农民和工匠等群体的移民,在主要以西欧、非洲和南北美洲为主的环大西洋之间的流动所建构而成。随着亚洲被纳入欧洲殖民体系,以及西欧国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与交通技术的大大改进,资本主义的扩张再次促成欧洲人的大量迁移。有统计显示,1800—1925年,有5000万—6000万欧洲人奔赴世界各地,其中85%的人口集中在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⁴正是在这一时期,大规模的华工出国现象开始出现,华工开始接替非洲奴隶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两波国际移民均以欧洲殖民者及其经济扩张所需的劳动力为主。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内生矛盾与扩展逻辑驱使欧洲人向外大量移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是生产力不足造成人口过剩,而是生产力增长要求人口减少,并且通过饥荒或移民来赶走过剩的人口”。⁵另一

1 李明欢:《国际移民政策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2 Marie McAuliffe and Anna Triandafyllidou, eds.,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2*, Geneva: IOM, 2021, p. 2.

3 Hein DeHass, et al.,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6th Edition, Houndmills: The Macmillan Press, 2020.

4 李其荣:《国际移民政策与治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5 [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强迫移民》,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2页。

方面，欧洲的殖民与市场扩张催生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于是，大量奴隶、苦力、契约劳工等被从非洲和亚洲诱骗、拐卖到新兴殖民地，构成了以欧洲殖民者及其扩张的经济活动所需的劳动力为主的错综复杂的跨洲跨国的国际移民大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波移民大潮却因西方国家内部的限制（诸如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因素被打断而告终。

全球“移民时代”是全球化发展的新产物。二战结束后，世界总体上进入和平年代，伴随着交通、通信与信息等新技术革命，世界进入“移民时代”。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统计（见表1），1970—2020年，国际移民数量的绝对人数，以及21世纪以来国际移民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都在持续稳定增加。

表1 1970—2020年国际移民数据

年份	国际移民数量/人	移民在世界人口中占比/%
1970	84,460,125	2.3
1975	90,368,010	2.2
1980	101,983,149	2.3
1985	113,206,691	2.3
1990	152,986,157	2.9
1995	161,289,976	2.8
2000	173,230,585	2.8
2005	191,446,828	2.9
2010	220,983,187	3.2
2015	247,958,644	3.4
2020	280,598,105	3.6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0,” <https://worldmigrationreport.iom.int/2000>, 2022-04-03。

如果说二战前的国际移民主要是以欧洲殖民者为主（欧洲人外迁以及欧洲殖民扩张催生的洲际移民），新时期的国际移民则更加多元。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注意到，人口输出可能是16—20世纪西方崛起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到20世纪末，却“出现一个不同以往但规模更大的移民浪潮”——一个受到“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所带动的以“非西方人口”为主的移民大潮。¹实际上，“非西方”只是这波新的国际移民浪潮的一个新特征，这波正在发生的移民潮在人口规模、迁移流向、移民类型、迁移动机、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各国

¹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移民政策、全球移民治理等方方面面都出现了新的特征，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最重要的话题之一，也成为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各个国家都开始注重走向海外的本国侨民以及迁入本国生活的外国侨民，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设立了部级以上的机构，专门处理国际移民问题。正因为移民流动在软硬件上的便捷，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拉力”与“推力”，移民开始更大规模地跨国流动。一些国家的“引智”政策，造成了另一些国家的“智力流失”；一些国家鼓励“叶落归根”，引发了另一些国家对移民“落地生根”的要求。国家层面的国际移民理性政策，可能导致全球层面的非理性，甚至是“公地悲剧”。由此，全球层面的国际移民治理也开始得到各界人士以及主权国家政府的重视。以国际移民组织的发展为例，1951年时其成员国家仅有23个，2023年已经有175个，观察员国家有8个，1950年其工作人员有352人（代表18个国家），2021年已经发展到10,184人（代表172个国家）。¹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多国反复交涉与磋商，第73届联合国大会最终在2018年12月通过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GCM），又称《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或《全球移民契约》。这是有史以来国际社会第一次通过政府间谈判达成关于国际移民的共同认识、责任、目标、承诺和行动，提出了解决国际移民问题的全方位构想，形成了全面规范国际移民的合作框架文件，成为国际移民问题全球对话和国际合作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²尽管未来国际移民的合作依然困难重重，《全球移民契约》的达成表明，国际移民问题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一个世界性议题。

三、国际移民研究的进展

由于移民跨越了国家边界，国际移民便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自17世纪民族国家诞生于西欧以来，学术界对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历经了三次重大的历史契机。第一次契机发生在18世纪末，由于北美独立战争掀起了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浪潮，后续由外迁入的人口成为首批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移民，这引发了相关学者对移民问题的早期观察和思考，并逐步发展为学科知识的一个子领域。第二次契机发生在20世纪中叶，二战后初期欧洲严峻的人口与难民危机引起对移民问题的集中思考和回应，推动国际移民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第三次契机发生于20世纪晚期，加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以及新一代通信和交通技术的普及，创造了全新

1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0*.

2 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 (A/RES/73/195), https://refugeesmigrants.un.org/sites/default/files/180711_final_draft_0.pdf, 2022-04-18.

的移民生态，由此盛行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思潮带动国际移民研究迈入交叉学科的新路径。

（一）美洲殖民地独立与成为学科分领域的国际移民问题

民族国家在西欧诞生后不久，就迅速转入了向外扩张势力范围的阶段，相继于世界各地开拓殖民据点。17—18世纪，西欧殖民者在大量驱逐、屠戮美洲土著居民后，运用流放、征募、诱骗和绑架等各种手段向美洲殖民地迁徙了大量外来人口，剧烈地改变了世界人口的历史性分布。其中，由西欧国家迁入美洲殖民地的人口在数量上尤为显著。弗朗西斯科·努涅斯·德比内达·依巴斯古念（Francisco Nuñez de Piñeda y Bascuñán）和玛丽·罗兰森（Mary Rowlandson）等殖民地早期居民，通过书信、诗歌、散文和日记等形式的文学创作，记述下艰苦的越洋旅途、对遥远故乡的思念和想象，以及同当地土著共处的生活。¹虽然他们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移民，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未引起广泛关注，但殖民地时期的美洲文学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凝结了人们对移民问题的早期观察和思考。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美洲陆续涌现出一批新兴民族国家。新独立的美洲国家在发展种植园经济及进行工业革命的过程中，继续吸引了大批欧洲、亚洲及非洲人口的移入。有别于殖民地时期，独立后移入的人口创造了更多管理实践层面的新需求。一方面，外来人口此时进入的不再是没有约束的“蛮荒之地”，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兴美洲国家开始设立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并制定政策作为规范和指引。²另一方面，独立后持续移入的人口增加了美洲国家身份建构的变量，如何处理好早期移民及其后代、当地土著和新移民共处下的各种社会关系，自此成为这些国家最关注的社会热点之一。³

以此为契机，美洲各国社会舆论对移民的讨论热度不断攀升，这一点在独立时间最早、移民输入数量最大的美国尤为突出。例如，美国最古老的文学杂志——《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 Review*）在1841年刊登评论文章，围绕爱尔兰裔移民潮和波士顿的爱尔兰社群，回顾建国以来有关“移民归化”（*naturalisation*）的政策讨论，并阐发对构建美利坚民族的思考。⁴另一份美国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自1847年起动态更新包含某时

1 详见张哲俊：《世界近代中期文学史》，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86—99页；姚媛：《玛丽·罗兰森的〈遇劫记〉和美国身份的建构》，《外语研究》，2008年第4期，第94—97页；金莉：《从玛丽·罗兰森的印第安囚徒叙事看北美殖民地白人女性文化越界》，《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年第1期，第130—137页；等等。

2 Andrew M. Baxter and Alex Nowrasteh, “A Brief History of U.S. Immigration Policy from the Colonial Period to the Present Day,” Cato Institute, August 3, 2021, <https://www.cato.org/policy-analysis/brief-history-us-immigration-policy-colonial-period-present-day#introduction>, 2022-03-06.

3 Hein De Hass, et al., *The Age of Migration*, p. 94.

4 “Art. VIII—The Irish in America,”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52, No. 110, 1841, pp. 191-234.

某地移民人数在内的各种移民信息。¹及至1851年, 目前已知最早以“移民”为题的专论在《马萨诸塞教师》(*The Massachusetts Teacher*)上发表。尽管文字中充斥着种族主义偏见, 但其中提出的“区别对待”(discrimination)、“同化”(assimilation)与“遣送”(deportation)三种应对主张²显示人们对移民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已进入新阶段。其后, 移民问题被纳入美国地理学学科的研究范畴, 1859年创刊的《地理学评论》(*Geographical Review*)³成为发表移民问题文献的主要平台。⁴持续涌入新兴美洲国家的移民潮, 不仅提升了当地社会对移民问题的讨论热度, 也逐渐引起欧洲移民输出国家学术界对该问题的重视。如在1868年, 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麦格理戈·艾伦(James McGregor Allan)于《伦敦人类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上发文讨论北美的欧洲移民及其后代。⁵次年, 英国人类学界在伦敦地质博物馆举行会议, 探讨与移民密切相关的北美民族构成问题。⁶可见, 美洲殖民地相继独立后, 伴随着移民管理实践需求的增加, 移民问题由最早的文学题材变成社会舆论热点, 最终成为地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子领域。

(二) 二战后成为显学的国际移民研究

国际移民研究在成为学科的研究子领域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不同学科对移民的研究相对孤立, 国际移民研究长期未能形成一个一般性的基础分析框架, 不利于该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现象直到二战后才迎来转变。二战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次沉重灾难, 却也意外成为国际移民研究大发展的重要契机。残酷的战争夺去了当时3%—3.7%的全球人口, 还使数以千万计的人流离失所。欧洲

1 参见“Immigration Via Québec,”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 No. 42, 1847, p. 331; “Emigr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 No. 51, 1847, p. 403; “Arrival of Immigrants,”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3, No. 1, 1847, p. 2; “A Year’s Immigr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4, No. 30, 1849, p. 234; 等等。

2 参见“Immigration,” *The Massachusetts Teacher*, Vol. 4, No. 10, 1851, pp. 289-291; “Emigration,” *The Massachusetts Teacher*, Vol. 4, No. 10, 1851, pp. 291-293。

3 该刊由美国地理学会出版, 为美国首份地理学专业期刊, 曾用刊名包括《美国地理与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and Statistical Society*) (1859—1870年)、《纽约美国地理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New York*) (1872—1900年)和《美国地理学会公报》(*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01—1915年)等。参见JSTOR, “Journal Info: *Geographical Review*,” <https://www.jstor.org/journal/geogrevi>, 2022年3月8日登录。

4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and Statistical Society*, Vol. 1, No. 3, 1859, pp. 90-92; “Russian Americ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and Statistical Society*, Vol. 1, No. 4, 1859, p. 121; “French E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and Statistical Society*, Vol. 1, No. 9, 1859, p. 283; etc.

5 James M. Allan, “Europeans, and Their Descendants in North America,”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6, 1868, pp. cxxvi-clxvii.

6 Thomas Henry Huxley, “On the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of North America: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The Journal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 1, No. 3, 1869, pp. 218-221.

作为主战场之一，面临着尤为严峻的人员伤亡和流离失所现象。¹为此，联合国于1950年设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并于次年制定首个与移民相关的国际公约——《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²西欧各国则于1951年12月响应美国和比利时的号召举行国际移民会议，并决定成立欧洲移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ICEM），即国际移民组织的前身。³在战后欧洲难民危机与人口问题的刺激下，一批当今最负盛名的移民问题专门研究机构、连续出版物和交流平台相继问世。如在1961年，ICEM主办的《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开始发行。该刊早期主要发表由ICEM官员撰写的政论文章和政策报告，⁴其后逐渐成为国际公认的高层次学术平台。⁵同年，苏塞克斯大学成立了英国最早的移民研究中心。⁶该中心1965年创办的《种族与移民研究》（*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影响因子常年稳居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移民类刊物排行榜首位。⁷同一时期，学界另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纽约移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of New York）在美国诞生，其创办的《国际移民评论》（*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也成为移民研究的顶尖期刊。⁸

二战后，欧美地区移民研究的专门机构、连续出版物和交流平台兴起的直接结果之一，便是产生了一批极具代表性且影响深远的移民基础理论，它们历经时间的检验，已经成为理解当今国际移民问题的重要基石。道格拉斯·马西（Douglas S. Massey）、华金·阿朗戈（Joaquin Arango）和格雷姆·雨果（Graeme Hugo）等研究者依据不同的问题指向，将这些基础理论分为两大类。一类旨在解释为何进行国际移民，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移民新经济学（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Dual Labor Market Theory），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它们将移民归因于个人的成本收益

1 “Costs of the War,”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World-War-II/Costs-of-the-war>, 2022-02-25.

2 《联合国难民署的历史》，联合国难民署，<https://www.unhcr.org/cn/%e8%81%94%e5%90%88%e5%9b%bd%e9%9a%be%e6%b0%91%e7%bd%b2%e7%9a%84%e5%8e%86%e5%8f%b2>，2022年2月25日登录。

3 程希：《国际移民组织在华项目有关情况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http://qwgzzyj.gqb.gov.cn/gjll/149/1475.shtml>，2022年2月25日登录。

4 Ahmet Icduygu, et al., “Progress of Migration Scholarship over 60 Year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59, No. 6, 2021, pp. 3-7.

5 李明欢：《国际移民政策研究》，第26页。

6 Sussex Centre for Migration Research(SCMR) Homepage, <http://www.sussex.ac.uk/migration>, 2022-02-25.

7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2020 Journal Performance Data for: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8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of New York, “About CMS,” <https://cmsny.org/about>, 2022-02-08.

计算、家庭劳动力风险对冲决策,以及国内、国际结构性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另一类则专注于探讨国际移民现象为何能持续存在,主要包括网络理论、制度理论、累积因果理论(Cumulative Causation)及移民体系理论,指出移民现象的持续存在得益于移民群体的社会网络、不断完善的各项移民管理制度、持续累积的移民优势因素,以及平衡国际人口流动的结构性力量。¹尽管上述两大类共九种基础理论仍离不开既有学科的滋养,但它们已立足于不同的分析层次,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国际移民现象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可被视为具有一定共识性基础的国际移民现象分析框架。随着国际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技术的进步,国际移民形势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新形势下,学界并未满足于学科知识界限的约束,推动国际移民研究朝着新的方向大步迈进。

(三)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移民问题的新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苏两极格局的瓦解进一步消除了全球人口跨境迁移的政治障碍,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也为国际移民注入了新动力。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及廉价航空客运在全球的普及,则深刻地改变了包括

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重点由原来的跨境群体渗透至跨境行为本身,名为“跨国主义”的理论新思潮逐渐占据主流。

移民在内的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以此为背景,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重点由原来的跨境群体渗透至跨境行为本身,名为“跨国主义”的理论新思潮逐渐占据主流。1992年7月,《纽约科学院年报》(*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以“移民的跨国视角:种族、阶级、族群与民族主义的再思考”为专题刊登系列文章。²这是“跨国主义”在移民问题研究中全面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其中,以美国人类

学家妮娜·席勒(Nina G. Schiller)为首的移民研究者指出,一类新型移民正在全球范围涌现,这类移民的网络、活动与生活涵盖了祖籍国与所在国,无法用社会科学中强调界限的既有概念来分析。因此,席勒等学者提倡挣脱社会科学的界限约束,运用“跨国主义”作为移民研究的新框架。其所提倡的“跨国主义”,即“移民建立连接祖籍国和所在国之社会场域(social fields)的过程(processes)”,该框架的理论优势在于“既能观察移民过程中的遭遇,分析移民的缘起,监测迁徙过程的变化,还能了解移民如何影响原籍国和居住国”。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移民研究者转向跨国视角,“跨国移民”在学术表达中的使用

1 Douglas S. Massey,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No. 3, 1993, pp. 431-466.

2 Nina G. Schiller, et al., “Transnationalism: A New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Migratio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645, No. 1, 1992, pp. 1-24.

频率渐渐赶超“国际移民”。¹

佩姬·莱维特(Peggy Levitt)和娜佳·贾沃斯基(Bernadette Nadya Jaworsky)通过总结跨国视角兴起后的理论发展指出,国际移民研究“已成为一个内在的交叉学科领域”。通过研究移民,研究者不仅在重新思考历史上形成的种族、阶级、性别、国家等各种社会边界,也在重塑着社会科学的知识界限。先前,不同的学科都在研究跨越国界的过程,但学科之间很少产生对话。而跨国研究视角则“代表了一种协调一致的努力,即以系统和综合的方式来观察治理、社会运动、收入和宗教生活在跨越国界时是如何变化的”。两位学者还指出,国际移民研究缘起于对移民接收国身份建构的探讨,因此,传统理论更偏重于研究移民的社会同化,而“跨国主义”则更关注移民与祖籍国的联系。跨国视角下的新研究发现,移民在融为接收国的一部分后,继续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五方面与祖籍国保持紧密联系。²学界对移民与祖籍国联系的重视,也反映在移民文献连续出版物和研究机构的发展上。如《国际移民》在20世纪90年代后,明显增加了亚、非、拉等地移民研究的刊文量,改变了原来对“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地区的单一关注,拓展了研究视野。³而在亚洲移民大国菲律宾,也诞生了亚太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斯卡拉布里尼移民研究中心(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⁴该中心创办的《亚太移民研究》(*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至今仍是在欧美地区以外出版发行的唯一一本成功跻身SSCI的移民类刊物。⁵上述变化表明,经济加速全球化一方面使国际移民问题进一步突破现有学科的知识界限,成为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使其不断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经验传统,汇聚更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知识。

四、国际移民研究的热点与前景

对全球化的乐观情绪,不仅推动国际移民研究进一步跨越学科知识的界限,也冲淡了其传统的“国家中心”色彩。国际移民研究继兴起“跨国主义”后又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和“在地转向”(local turn)等进一步去除“国家中心”的发展趋势。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在困

1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谷歌学术和科学网(Web of Science)等学术搜索引擎分别对“国际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和“跨国移民”(transnational migration)两项词条进行内容检索,通过比较二者出现的频次,得出此结论。

2 Peggy Levitt and B. Nadya Jaworsky,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 Pa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3, 2007, pp. 129-156.

3 Ahmet Icduygu, et al., “Progress of Migration Scholarship over 60 Year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59, No. 6, 2021, p. 5.

4 李明欢:《国际移民政策研究》,第28—29页。

5 SSCI, “2020 Journal Performance Data for: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顿中艰难复苏，而频繁的地缘政治冲突、剧烈的气候变化以及各种突发灾害，加剧了极端保守主义和右翼民粹势力在全球的蔓延。时代环境的变化，不仅使国际移民研究关注的热点出现了相应调整，也凸显了其面临的挑战。但国际移民问题在挑战中仍焕发着生机和活力，不乏继续向前发展的机遇，以及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一）时代环境变化与当前国际移民研究热点

当前国际移民研究热点厚植于冷战后的时代环境变化。当人们普遍沉浸在对各种时代新变化的憧憬时，亨廷顿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这两位富有远见的学者已敏锐地指出人类即将面对的新问题。其中，亨廷顿判断文明的冲突将取代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的竞争，成为冷战后人类纷争的主要形态。基于此，他一方面呼吁人们关注“文明的断裂带”以及各大文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不均衡发展，¹另一方面向主要由移民及其后裔构成的美国人发出“我们是谁？”之问。²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在日益繁多的跨国行为和联系中，捕捉到“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distance Nationalism）滋生的问题。³他们颇具前瞻性的洞见，已经逐一得到印证。例如，“9·11”事件成为文明冲突的放大镜和加速器，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失败干预在全球各地埋下了暴力和冲突的种子。此外，资本、货物、人口和信息的全球流动，并未朝着普惠、均衡与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反而以某种形式的相对剥夺为代价，一方面腐蚀了理性主义的社会文化根基，另一方面意外触发了包含气候与生物在内的多种自然机制的连锁反应。总之，冷战后种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与自然环境变化，一步一步牵动着世界迈向百年未有的时代变局。在此变局之下，国际移民研究关注的热点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

阿斯亚·皮萨雷夫斯卡娅（Asya Pisarevskaya）等研究者运用隐含狄利克雷分布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直观呈现了时代环境变化下国际移民问题热点的转变。他们对40本移民研究刊物和4部移民类丛书进行文献主题建模和计量分析，并划分出“性别与家庭”“移民的地理位置”“治理与政治”“卫生”等8个一级主题分类和59个次级分类。研究发现，“性别与家庭”和“卫生”

1 详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2 详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3 详见Benedict R. O'G. Anderson,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 World Capitalism and the Rise of Identity Politics*, Amsterdam: Center for German and European Studies, 199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甘会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72—93页；[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民族主义研究的新困惑》，高瑾译，载[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254页。

主题的研究数量在过去30年间出现快速增长，而“移民融入”“移民的地理位置”和“移民数据”主题的研究则显著减少。通过对次级主题分类进行纵向和横向的细化研究，皮萨雷夫斯卡娅等人发现，2008年至今的移民文献主题呈现如下四种发展趋势。首先，“流动性”和“侨民与跨国主义”成为最突出的主题，表明对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反思已占据学界主流。其次，与“冲突、暴力与移民”和“宗教多样性”主题相关的研究数量大增，显示了人们对近年难民危机的广泛关注。再次，“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移民”“亚洲移民”与“黑人研究”依然是三组关联性较强的主题，反映了以欧美研究者为主导的移民学界的传统地理偏好，以及对21世纪亚洲高技术移民潮的持续关注。最后，移民的主观体验继续得到重视，学界对移民及其后代的“身份叙事”（identity narratives）保持较高的研究热度。同时，学界对“卫生”主题的探讨已由生理层面拓展至心理层面，结构性歧视和种族主义所引发的移民社会心理问题得到越来越多关注。¹

（二）立于时代的反思、解构与国际移民研究面临的挑战

国际移民研究热点在时代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出现调整并日趋多元化本是符合研究发展规律的正常现象。但这在一些独具批评精神的研究者看来，却可能隐藏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移民问题研究主题过于贴近广受热议的时代环境变化可能产生学术伦理方面的问题。威廉·申克尔（Willem Schinkel）就以西欧移民问题研究现状为例指出，在特定公共话语下寻求研究资助和发表机会的研究者，容易将移民及其后裔“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助长不当的公共话语和政策实践。为此，他呼吁移民研究者常常自省“谁才是研究的真正受众”。²另一方面，主题的多元化趋势则可能加剧移民问题研究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研究者此前对该领域碎片化的忧虑主要囿于学科知识的界限。“跨国主义”兴起后，移民研究成为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曾期待该领域借此能出现更具共识的概念和理论突破。但正如马可·马尔蒂尼埃罗（Marco Martiniello）通过观察欧洲与北美的移民研究现状时所指出的，该领域仍存在多种形式的碎片化，而以研究主题为分界正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当前的移民研究大致可按主题分为两大类：一类旨在分析移民流向和人口流动模式，研究问题包括移民的规模、动因、目的地和移民政策等；另一类则关注移民到达目的地后的遭遇和境况，探讨包括移民的社会融入、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以及针

1 Asya Pisarevskaya, et al., “Mapping Migration Studi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oming of Age of A Research Field,” *Migration Studies*, Vol. 8, No. 3, 2020, pp. 455-481.

2 Willem Schinkel, “Against ‘Immigrant Integration’: For an End to Neocolonial Knowledge Production,”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Vol. 6, No. 31, 2018, pp. 1-17.

对移民的歧视等问题。这两类研究之间通常缺乏交集。¹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不仅反思移民研究当前面临的挑战,还主张从源头解构移民研究存在与发展之合理性,进一步揭示其深层次问题。例如,贾妮娜·达欣登(Janine Dahinden)就直白地指出,“没有现代民族国家,就不存在我们所认知的移民和移民研究”。她认为,移民研究源于民族国家对移民的规范化,移民管理机构的规范化话语已经深深地嵌入人们对移民问题的思考中。移民研究对规范化话语的依赖,不断助长将族裔视为移民天然分类的世界观,最终只能化作合理强化移民管理和控制的注脚而无助于学术进步。²布里吉特·安德森(Bridget Anderson)也认为,如同国家边界并非天然存在,人口的跨境流动也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但移民研究者常常“不加批判地将民族国家视为自然的社会和政治形式”,且不自觉地卷入其建构过程。他指出,民族国家基于创建领土边界和人口治理的目的,通过区分“移民”和“公民”固化流动人口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使所有关于移民的术语都内嵌了“本地人”(natives)与“外地人”(aliens)的紧张关系。因此,尽管研究者努力说明移民的移入能带动当地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繁荣,但人们总是倾向于将移民想象为国家和社会稳定的破坏者。³达欣登与安德森所代表的观点,实则延续了政治学家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与席勒多年前对“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反思。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移民研究同民族国家的“纠葛”(entanglement)并未随时代环境的变化而淡化,反而更为凸显。

(三) 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前景

国际移民研究无法轻易跳脱“威斯特伐利亚紧身衣”,仍将长期为深层次挑战所困。但是,这并不代表其研究前景黯淡,挑战的背后早已蕴藏了继续向前发展的路线图。首先,从实践角度看,虽然时代环境的变化确实重新彰显了民族国家在移民问题中的地位 and 角色,但也暴露了其在应对移民问题方面天然的不足。因此,国家层次以外的行为体开始倾注更多资源,助力思考有效应对移民问题之策。例如,欧洲和非洲均各自组建了地区移民研究网络。其中,欧洲的移民研究网络通过设立研究基金资助了多个学术培训、交流和出版计划。⁴联合国则于2018年宣布成立全球性的移民网络,该网络通过创建虚拟讨论平台、更新移

1 Marco Martiniello, "Comparisons in Migration Studies,"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Vol. 1, No. 1, 2013, pp. 7-22.

2 Janine Dahinden, "A Plea for the 'De-Migranticization' of Research on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39, No. 13, 2016, pp. 2207-2225.

3 Bridget Anderson, "New Directions in Migration Studies: Towards Methodological De-Nationalism,"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Vol. 7, No. 36, 2019, pp. 1-13.

4 "About IMISCOE," IMISCOE, <https://www.imiscoe.org/about-imiscoe/mission>, 2022-03-15.

民专家数据库和编列同行评议名单等形式，为所有移民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和服务。¹这些超国家组织针对移民问题的投入和相互协作，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研究者对国家规范化话语和研究资源的依赖、破解“国家中心”的深层挑战，还将推动地区乃至全球移民学界形成更具共识性的概念和理论。其次，从理论角度看，研究者在揭示移民研究现存挑战的同时，也在不断摸索破解之法。一种较进取的观点认为，应将移民问题从民族国家的“原罪”中抽离出来，在研究和规范化话语间保持适当的距离。具体办法包括更多地使用性别、阶级和种族等社会科学分析性概念工具，减少对移民、难民和外国人等规范化术语的借用，以及“将分析单位从移民人口重新定向到全体人口”，等等。²另一种偏温和的观点则指出，应承认并努力揭示国家权力及其主导秩序对移民问题的持续作用，同时注意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对移民问题的影响。³总之，挑战并未真正阻滞移民问题的发展，反而开拓了更多新的可能性。

这些超国家组织针对移民问题的投入和相互协作，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研究者对国家规范化话语和研究资源的依赖、破解“国家中心”的深层挑战，还将推动地区乃至全球移民学界形成更具共识性的概念和理论。

五、结语

现代民族国家具有领土、人口和主权三大基本特征，而移民则具有跨越边界、重组人口和冲击主权的复杂特性。数百年来，以民族国家体系的产生、扩散和裂变为契机，移民问题逐渐获得了世界性关注。西欧和北美作为民族国家形成和早期发展的中心舞台，长久以来也是国际移民研究的主要阵地，至今仍对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路向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由西方移民研究者建构的每一种新范式、提出的每一种新概念或归纳的每一种新理论，几乎都会被迅速引入其他非西方的案例现场反复进行检验，产生巨大的涟漪效应。本文限于篇幅，故仅对国际移民问题在缘起、发展和热点等方面作概要性介绍，没有叙述案例检验的部分。此外，非西方移民的本土经验，除了可以作为西方的参照，更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诸如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一大批学术成果，也为国际移民研究作出了西方经验难以替代的贡献。⁴

1 “Migration Network Hub,” UN Network for Migration, <https://migrationnetwork.un.org/hub>, 2022-03-15.

2 Janine Dahinden, “A Plea for the ‘De-Migranticization’ of Research on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3 Bridget Anderson, “New Directions in Migration Studies: Towards Methodological De-Nationalism.”

4 张振江、吉伟伟编：《“一带一路”相关地区与国家侨情观察2018》，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实际上,正如亨廷顿所言,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非西方国际移民的实践与理论,在与西方研究的互鉴中,可能会成为国际移民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各国相继出台了不同程度的对跨国人口流动进行控制与管制的措施,加之近几年凸显的难民问题,现实世界并未如很多西方学者呼吁的那样去除“国家中心”,“国家”反而再次回到移民治理的主场。如何让“移民”和“国家”的关系更加融洽,才是未来国际移民研究与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